

* 專題演講 *

康熙御定《全唐詩》的時代印記與局限*

周勛初**

御定《全唐詩》中存在的問題，經過學術界的多方抉發，已有共識，其大要有如下數端：一、缺收較多，二、誤收嚴重，三、互見迭出，四、不注出處，五、校勘粗疏，六、小傳簡陋，七、編次失當等，每一個方面都可以舉出大量例證，今不贅述。^①

這些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呢？原因當然很多，但可概括地說這是時代局限的反映。

一、纂修《全唐詩》的時代背景

滿州貴族入主中原，因其原來的文化水平較低，需要經過一段時間逐步加以提高，接受中原地區向占主導地位的漢族文化，因此清世祖福臨在位之時，沒有籌辦過什麼大型的文化活動。況且這時各地尚有擁護明室後裔的軍事活動在繼續，官僚隊伍中滿漢的畛域尚未混合，傾軋時生，統治者無法在文治上投入更多的力量。

清聖祖玄燁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帝皇之一，文治武功均有可觀。他勤奮好學，接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，達到了很高的水平。在他繼位初年，致力於排除本族勳舊對他的控制，中年以後，天下大定，也就逐漸轉到偃武修文的路子上來。他要通過若干措施，表明滿族建立的王朝符合正統規範，文治之隆不下前代。除按改

* 本文為周教授於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在本處發表的專題演講稿。

** 南京大學古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。

① 參看陳尚君、羅時進：〈《全唐詩》的缺憾和《全唐五代詩》的編纂〉，載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第256期（1992年3月20日，中華書局發行）。需要說明的是：上述缺點常有交叉的情況，例如互見類中甲方之詩若確屬其所作，則乙方之詩實為誤收。

朝換代後的慣例纂修前代歷史外，敕修之書達四十餘種，其中又以《全唐詩》的規模為最大。

唐代是中國歷史上詩歌最為發達、成就最為突出的時期，流傳下來的眾多作品，一直受到文士的重視和喜愛。康熙四十五年徐倬編《全唐詩錄》一百卷呈上，玄燁大喜，作序褒揚，賜金刊版。其時玄燁正命曹寅組織人力在揚州編纂《全唐詩》，兩種唐詩集子同時完成，並且得到帝王的揄揚，可見此亦一時風會。玄燁大力提倡唐詩，當是以為自己的文治武功可以繼軌唐人。

《全唐詩·凡例》之一曰：

唐高祖〈賜秦王〉詩云：「聖德合皇天，五宿連珠見。和風拂世民，上下同歡宴。」見於《冊府元龜》。明胡震亨謂唐初無五星聯聚之事，疑其偽託，今刪去，斷自太宗始。且一代文章之盛，有所自開。

胡震亨《唐音統籤》中的〈甲籤〉卷一此詩按語雖對此詩有所懷疑，但對首列高祖此詩則持堅定的態度。《唐音統籤》卷三一〈集錄〉二敍初、盛《唐詩記》時，指責吳琯「草草付梓」，「至於遺漏之多，開卷即失一高祖詩，他何論！」季振宜《唐詩》亦列高祖〈賜秦王〉於全書之首，御定《全唐詩》則逕行刪去。這樣做，目的是在落實「一代文章之盛，有所自開」之說，而這顯有以古喻今之意。因為唐高祖初創帝業，文治未興，要到太宗之後，才籌辦起好幾項大型的文化事業，這與清初情況極為相似。曹寅等人在〈進書表〉中頌揚玄燁「武功定而載戢干戈，文教敷而爰稽典籍」，點明了其時方針大計的改變軌跡。

由此觀察御定《全唐詩》的編纂，將其置於清初的時代背景下加以透視，可知此中實有深刻的用意。^②

綜觀玄燁舉辦的一些文化事業，以「御定」名義編纂的若干著作，雖似氣勢很大，但很難說是通過嚴密的組織工作、作出巨大的努力而完成的皇皇巨製，這與高宗弘曆集合學界精英纂修《四庫全書》的偉大事業未可相提並論。玄燁得到了季振宜《唐詩》的稿本，面交曹寅，諭其再用胡震亨《唐音統籤》作補充，纂成《全唐詩》九百卷。此書因有明、清兩代集大成的兩種本子作基礎，工作的難度本來不大，

^② 參看陳修武：〈《全唐詩》的編校問題〉，臺灣《書目季刊》第九卷第一期（1975年6月出版）。

而從曹寅等人介紹季書時隱約其詞的情況來看，目的當然是把功績歸於皇上。他們接受這項任務，只花了一年零五個月就大功告成，目的是在追求速效，玄燁對此極為滿意，因為這正與他要在文治上急於有所表現的願望相符。

曹寅主管的江寧織造署，屬內務府管轄，因此他的身份本是一位事務官員，而非文學侍從之臣。玄燁命他主持編纂御定《全唐詩》，可見其地位之特殊。曹寅為正白旗人，說明他雖為漢族，但早已隸屬滿族八旗編制。曹家的身份為「包衣」（滿族中奴僕的稱呼），曹寅的母親為玄燁的乳母，可見其與主子關係的深切。曹寅祖孫三代「世襲」江南織造，又曾兼管兩淮鹽務，這些都是享有很多經濟特權的肥缺，說明玄燁對他的垂顧，讓其能有財力開展各項特殊活動。因為曹寅本人能詩善曲，在士人中頗具聲望，而從他在江南結識了不少明代遺民，如錢澄之、杜濬、杜峕、顧赤方等，還結交了詩人曲家朱彝尊、施閏章、洪昇等，可見其交游之廣。他曾多次奏報玄燁之師熊賜履病故、家產及生活情況，多次奏報江南科場案情，可見其對文教方面動態之關注。玄燁在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〈江寧織造曹寅奏謝欽點巡鹽並請陛見摺〉後批曰：「倘有疑難之事，可以密摺請旨。凡奏摺不可令人寫，但有風聲，關係匪淺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」又在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日曹頌請安摺尾批曰：「念爾父出力年久，故特恩至此。雖不管地方之事，亦可以所聞大小事，照爾父密密奏聞。」可知曹寅的地位不同於一般的行政官員。江寧織造署實際上是玄燁安置在江南的一所情報機構，曹寅肩負著在文化陣線上聯絡江南文士的重任。^③

滿州貴族入主中原，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，曾經激起漢族人士強烈反抗，江南地區被鎮壓踐踏的情況尤為慘烈。而自唐代起，江南一帶逐漸發展為全國經濟最為富饒之區，文化上也最為繁榮。明亡之時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嗣立稱帝，發生過很大的影響。因此，玄燁即位之後，曾經先後六次去江南巡視，目的之一就在消除江南士人中敵視情緒。應該說，康熙四十四年五次南巡時，滿漢畛域至少在表面上已經泯滅，士人中的反抗情緒也已大體消除，但玄燁攜季振宜《唐詩》前來，命曹寅在揚州刊刻，則仍是前此政策的延續，籠絡江南士族中人，讓他們參與新朝的文治。

考察御定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十人的家世與身份，就可看出這項活動的深層用

^③ 參看周汝昌：《紅樓夢新證》第七章〈史事稽年〉，（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6年版）。李希凡：《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·前言》（中華書局，1975年版）。

意。一般說來，江南多書香仕宦世家，而參與此書編纂的這十人中有些人的情況尤為突出，與清王朝的關係頗為深切。

彭定求為江蘇長洲人。父彭瓏，以禮法持家，卓有聲譽，江藩〈彭瓏記〉曰：「彭氏在明時，仕不過七品，自瓏以後，一門鼎貴，為三吳望族。瓏治家整肅，至今子弟恪守庭訓，不逾規矩，有萬石之遺風。江南世祿之家，鮮克有禮，當以彭氏為矜式焉。」（《碑傳集》卷九十）

楊中訥為浙江海寧人。其父楊雍建，有直聲，順治、康熙兩朝均深得寵信，其後子孫繁昌。朱彝尊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公（雍建）神道碑銘〉曰：「天之報施，於善人厚，子孫繩繩，各佩章綬，百祿攸宜，克昌厥後。」（《曝書亭集》卷七一）。

潘從律，江蘇溧陽人。其父曾瑋注意培植子弟，子八人，孫三十人，均成大器，邑人擬之萬石君家，遂成溧陽望族。從律奉詔校刊《全唐詩》前後，已是一門四進士了。^④

汪士鋐，江蘇長洲人。弟兄四人均有文名，長兄汪份，弟汪倓，均曾入翰林任編修，沈彤〈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鋐行狀〉曰：「自先生入翰林及預講幄，每奏對進講，獻所為詩若文，多有裨政治，不徒以閎博辨麗為能，以故上特重其才與志，頻加褒寵，賜御書、硯筆、珍饌、瓜果、金帛甚厚，且駸駸欲大用之，以觀其效。一時知遇莫與比倫。」（《碑傳集》卷四七）。

徐樹本，江蘇崑山人。在參與編校工作的十人中，他的家世最為顯赫。伯父徐乾學、父徐元文、叔徐秉義，皆與清室關係深切，不待詳論。

車鼎晉，本為湖南邵陽大族，後徙家江寧。其父車萬育，任諫官二十餘年，直聲震天下，深得玄燁賞識。玄燁南巡時，曾特命召見，車鼎晉廷對時，玄燁亦曾表示顧念其父。而當玄燁五次南巡時，萬育已逝，玄燁又復召鼎晉問其父病歿詳情，並諭令葬江寧，恩寵有加。^⑤

查嗣琛，浙江海寧人。查氏為海寧望族，明清之際人才輩出，且均以詩文知名。

俞梅，江蘇泰州人。其父俞澂曾候選中書。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召見俞澂，溫綸

④ 潘曾瑋事見史炳等纂修：《溧陽縣志》卷十一〈人物志·宦績〉，嘉慶十八年成，光緒二十二年重刊。潘氏一門科舉名錄見同書卷十〈選舉制·進士〉。

⑤ 車萬育事見熊賜履所撰墓志銘，載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初編卷百三十四〈諫臣〉二；車鼎晉事見王文清所撰墓志銘，載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卷百二十一〈詞臣〉七附錄。

嘉獎，御書「耆年貽穀」扁額以示褒寵。^⑥

從上述介紹中不難看出這些編校官的家族在江南地區的地位，以及這些家族與滿清新建王朝的關係。^⑦

佚名《聖祖五幸江南全錄》載康熙四十四年三月二十日「賜蘇州各鄉紳彭定求等每位茶食、滿點一盤」，並誇彭曰：「汝學問好，品行好，家世好，不管閒事」，定求《南畝詩集·乙酉集上》有〈三月二十日行在奉旨校刊《全唐詩》〉詩；又《聖祖五幸江南全錄》記載三月二十二日「傳上諭，諭江撫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、汪繹、徐樹本，欽召纂修書史。」可知上述四人為玄燁首先考慮纂修此書的合適人選，彭定求與汪繹為狀元，汪、徐二人則與皇室的關係特別深切。

這十名編校人員都是閒散居家的在籍翰林，也就是一些逍遙自在的鄉紳，由這樣的人負責編書，自然不能過於緊張，把時間拖得太長。從曹寅的奏摺與各家詩文記載來看，其時常駐書局工作的人不多，因為十人都在江浙兩省居住，交通方便，因此不時有人回家。查嗣琛《查浦詩鈔》卷八〈錫山道中〉有句云：「一枕揚州夢乍醒，三年此地九曾經」，自注：「奉命校書維揚，自乙酉至丁亥竣事歸，凡九往返。」其他人的情況大體相同。康熙遴選這樣一批人物辦事，也就是利用他們的才幹，追求速效，而並不打算在質量上提出很高的要求，讓他們作艱苦的整理工作。

這十名科舉場中春風得意人物，其科名的世次是：彭定求為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會元、狀元，沈三晉為同年二甲二名進士，潘從律為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解元、二十一年（1682）進士，楊中訥為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傳臚，汪士鋐為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會元、傳臚，徐樹本為同年二甲二名進士，車鼎晉為同年二甲三名進士，汪繹為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狀元，查嗣琛為同年進士，俞梅為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進士，他們具有這樣的經歷，也就會在編纂《全唐詩》時留下鮮明的印記。御定《全唐詩》凡例之一曰：

唐人世次前後，最為冗雜，向來別無善本，《全唐詩》及《唐音統籤》亦多訛謬，應以登第之年為主。其未曾登第，及雖登第而無考者，以入仕之年為主。

……

^⑥ 俞氏父子事見王有慶等纂修：《泰州志》卷二四〈文苑〉，道光十年刊。

^⑦ 參看羅時進：〈《全唐詩》十編校跋錄〉，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。

這一體例，季振宜《唐詩》與胡震亨《唐音統籤》均未提及，顯然是這些翰林注重登第年輩的觀點的反映。唐人以進士及第爲重，而不論進士、明經、制舉出身，均對唐代士人的仕進有甚大影響。從這一角度來說，重視文士登第之年，自然是有道理的。但同一時期的人有的少年登第，有的晚年登第，時間可以隔得很遠，據以編排世次前後，就會發生很多問題。例如高適，前期蹭蹬不遇，直到五十歲時才應有道科登第，因此御定《全唐詩》將其列於韋應物、包佶、李嘉祐、皇甫曾等人之後，實則高適要比這些人年長的多。高適是典型的盛唐詩人，後者則應列爲中唐作家，如以登第之年爲序，自難以看出詩風的遞變。《新唐書·趙宗儒傳》曰：「（趙驊）敦交友行義，不以夷險恩操。少與殷寅、顏真卿、柳芳、陸據、蕭穎士、李華、邵軫善，時爲語曰：『殷顏柳陸，李蕭邵趙』，謂能全其交也。」其中蕭、李、趙、柳四人同爲開元二十三年（735）進士，顏真卿爲開元二十二年（734）進士，邵軫爲開元二十五年（737）進士，然而殷寅則遲至天寶四載（745）始登進士第，御定《全唐詩》列趙驊詩爲第二函、九冊、一二九卷，顏真卿詩爲第三函、二冊、一五二卷，李華詩爲第三函、二冊、一五三卷，蕭穎士詩爲第三函、二冊、一五四卷，殷寅詩爲第四函、八冊、二五七卷，前後間隔甚遠，或許就是考慮到登第之年不同。但諸人既自少交好，則早在登第之前應當就已開始磋磨詩藝，後人編纂詩歌總集時，理當將之聚在一起。況且御定《全唐詩》在趙驊與顏真卿之間插入崔顥、祖詠、李頎、綦毋潛、儲光羲、王昌齡、常建、杜顥、李嶷、崔巨、蔣維翰、萬楚、范朝、楊顏、王諲、王岳靈、周萬、陶翰、劉長卿等人，中唯李頎與蕭、李、趙、柳四人同爲開元二十三年進士，其他的人均非同年，可見御定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雖標榜「應以登第之年爲主」，實際上也無法貫徹。這一編纂方式，後起的詩歌總集從無遵行之者，可見這種體例不合實際，自然被淘汰掉了。

二、遴選編校人員的標準和由此產生的缺憾

康熙遴選這十名編校人員，顯然著眼於他們的文才而並不著眼於他們的學識。《聖祖五幸江南全錄》記四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在杭州，召鄉紳沈三曾、楊中訥、查嗣璣等「俱進行宮做詩」，四月二十四日在常州府，又召在省鄉紳車鼎晉、潘從律等「進宮朝見考詩」，說明玄燁遴選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時，著眼於他們的詩才，而這實際上是一種偏頗的觀點。

徐倬選錄《全唐詩錄》一百卷，深得玄燁讚賞。這是他個人的撰著，選什麼詩，如何編排，完全可以由個人決定。這類選本，主要體現編者的眼光，因而與個人的詩才有關，而與個人的學識關係較淺。編纂《全唐詩》情況大為不同；如何做到「全」？「全」了之後，又怎麼編排？一人的集子有多少版本，如何甄別善本？各本之間的歧異，如何校勘？作品歸屬不明，又如何鑒定？前代與後代的作品屢入，又如何剔出？散佚在其他類別的書籍中的詩篇，如何搜集？詩人的傳記又如何編寫？……這些都不是靠詩才所能解決問題的。它需要的是篤實的學識。

這十位翰林，都是一些才氣過人的人物，但在學識上可未必有什麼優勝之處。例如「查氏二才子」中的查嗣琛，查為仁《蓮坡詩話》言其在天津時與趙執信輩「擘箋飛翠，殆無虛日」，鄭方坤〈查浦詩鈔小序〉則云與兄慎行「弟酬兄唱，斐然可觀。」可見他愛好詩歌，自少至老不廢吟咏。而他著有《查浦輯聞》二卷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三三〈雜家類存目〉十中此書提要曰：「大抵皆節錄原文，無所考據。……其以《鶴林玉露》為葛立方作，未免筆誤；至以楊瑀為楊琚，以葉子奇為葉子才，則校刊者之疏也。」措詞委婉，當是四庫全書館臣對這位翰林前輩的掩飾之詞，實際上是一種婉轉的批評。近代學者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卷七則直說嗣琛，「讀書似不甚多。所撰《查浦輯聞》，略無義類。視慎行為遜。」

其他幾位翰林的情況也相近。楊中訥居家輯拙宜園，與在籍翰林查慎行等仿白居易「香火社」故事，結「耆英會」，飲酒賦詩其中。彭定求〈同年沈允斌（三曾）宮贊挽詞〉其二曰：「八咏風流蚤擅場，雲山十載坐徜徉。」（《南畝詩稿·丙戌集》卷下）而他作〈汪東山（繹）修撰挽詞〉其四曰「緣何嘔血事酸辛，詞翰研精便損神。從此騷壇風月地，共垂垂涕惜斯人。」（同上）又挽詞其一首二句曰：「才名藉甚動簪紳，仙骨珊珊本軼塵」，這可以說是十位編校者或多或少具有的以詩才見長的共同點。

這十人中，有些人也學有專長，如彭定求服膺陸王心性之學，^⑧楊中訥湛深經術，^⑨汪繹好為占驗之術等。^⑩徐樹本家多藏書，又以典章制度為有用之學；^⑪汪士鋐略具考訂之才，曾有多種著作傳世，在十人中，或許較為適合於作《全唐詩》

⑧ 參看彭氏國史館本傳，載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初編卷百十七〈詞臣〉三。

⑨ 參看查慎行撰楊氏墓志銘，載《國朝耆獻類徵》初編卷百二十一〈詞臣〉七。

⑩ 參看《隨園詩話》卷十四有關記載。

⑪ 參看王峻等纂修：《昆山新陽合志》卷二十五〈文苑〉二徐氏本傳，乾隆十五年刊。

的編校工作。^⑫但汪氏《長安宮殿考》二十卷成書之後，後人少見稱引；而當乾嘉樸學興起之後，徐松作《唐兩京城坊考》五卷，已成治唐代文史者案頭必備之書。可以看出二者水平的高下。這裡不光是二人學識如何的問題，而是時代有所不同。康熙之後，學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乾嘉學派崛興，考據之業大盛，整理古籍的水平自然也就遠邁前人。

康熙之時的著名學者，如王士禛、朱彝尊等，詩文兼擅，學問亦佳，但競務博覽而未趨專精，考訂之學未臻高境。《全唐詩》編校十人長於詩才而短於詩學，亦為一時風氣所限，後人指摘御定《全唐詩》的缺點時，應從時代背景上加以考察，始能有全面了解。

在御定《全唐詩》的詩人小傳中，編校人員個人修養的優缺點暴露得很明顯。例如此書第二函、十冊、一四〇卷王昌齡小傳曰：「王昌齡，字少伯，京兆人。登開元十五年進士第，補秘書郎。二十二年，中宏詞科，調汜水尉，遷江寧丞。晚節不護細行，貶龍標尉卒。昌齡詩緒密而思清，與高適、王渙之齊名，時謂王江寧。集六卷，今編詩四卷。」寥寥數語，可謂文筆省淨，足徵編校人員文才之佳。他們在短短的一年半中，依靠季、胡二書編成《全唐詩》九百卷，所有詩人小傳全部改寫，如果文思不敏捷，那是無法完成任務的。這是他們的過人之處。季書詩人小傳均以新、舊《唐書》本傳或《唐詩紀事》、《唐才子傳》等書中的現成材料綴合而成，繁冗而少剪裁。胡書小傳較謹飭，取材亦較宏博，除正史外，旁及雜史、筆記、地志、詩話及各家別集等文獻，且頗有考訂，如《唐音統籤》卷一百九〈丙籤〉二十一王昌齡小傳駁《新唐書》以王昌齡為江寧人而不言其官江寧之誤，斷之為關中人而官江寧者，甚具識見，傅璇琮主編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卷二王昌齡傳即採其說。御定《全唐詩》吸收其成果而略去考訂過程，也自有其道理。《全唐詩》凡例之一曰：「詩前小傳，但略序其人歷官始末，至於生平大節，自有史傳，不必冗錄。」只是詩人見之於史傳者不多，王昌齡雖見錄於兩《唐書》，而記載不詳，「與高適、王渙之齊名」云云，顯然是引用了薛用弱《集異記》中的材料。但「王渙之」實為「王之渙」之誤，近世發現靳能所撰之〈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並序〉，更可明白詩人王之渙的生平。^⑬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不能發現盛唐名家王之渙名字有誤，

^⑫ 參看沈彤：〈右春坊右中允汪先生士鋐行狀〉。

^⑬ 此石拓本載於李希泌編：《曲石精廬藏唐墓志》（齊魯書社，1986年版）。

也是詩學疏陋的表現。他們僅重歷官始末，也是其官僚意識的體現。

三、從後起的乾嘉樸學看御定《全唐詩》的局限

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，玄燁命張玉書、陳廷敬等人編成《康熙字典》，共收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字，發生過極為巨大的影響，但其中疏漏、錯誤不少。道光年間，王引之奉敕撰《字典考證》，即更正了二千五百八十八條。但王氏擔任此項工作實多顧忌，故糾繆頗不徹底，當代學人繼之續有訂正。^⑭可見乾嘉學派興起之後，康熙時代的一些著作，顯得問題叢雜，亟須補正，這是學風轉變的結果。

清代樸學肇始於顧炎武，繼之而起者代有名儒，但到乾嘉之時，始匯成洪流，大師輩出，並且形成了一整套重實證的治學規範，從而使一系列傳統的學術都呈現出新的面貌，如金石、名物、地理、職官等專門之學，通過深入的考據，都達到了新的水平。後來的學者接受這一遺產，方法更趨縝密，返視御定《全唐詩》，更可看出問題之所在，從而說明此書編校人員的時代局限。

最足以說明御定《全唐詩》工作草率和時代局限的部份，是其中自第十一函、七冊、七六九卷至第十一函、八冊、七八四卷共十六卷的所謂「世次爵里無考」者，內有詩人三百三十一人，約占《全唐詩》所收人數的七分之一。《全唐詩》的前身，胡震亨《唐音統籤》中的〈己籤〉六中亦有世次無考者四卷，共收一百三十六人，然大都注有出處，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為圖省便，逕將出處刪去，更使讀者難以明白這些詩歌的真偽和背景。實際這些所謂「世次爵里無考者」中很大一部份人還是可以考知的，只是這些編校人員一無興趣、二無能力解決問題就是了。

《全唐詩》卷七六九錄徐璧〈失題〉一首，曰：「雙燕今朝至，何時發海濱？窺簾向人語，如道故鄉春。」此詩又見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二九〈禽獸〉門，題曰〈春燕〉，作者署名亦作徐璧。按《唐詩紀事》卷二五敘徐安貞曰：「安貞，始名楚璧。應制舉，三登甲科。」徐安貞是開元時期的著名文士，新、舊《唐書》均有傳，《舊唐書·文苑傳》曰：「徐安貞，信安龍丘人。尤善五言詩。嘗應制舉，一歲三擢甲

^⑭ 參看黃雲眉：〈清代纂修官書草率之一例——《康熙字典》〉，載《金陵學報》第六卷第二期（1936年）；後收入《史學雜稿訂存》（齊魯書社，1980年4月新一版）。黃氏又云：「其書與《佩文韻府》、《淵鑿類函》等，皆疵累層出，不可依據。」又王力著有《康熙字典音讀訂誤》一書，共五十六萬多字（商務印書館，1988年版）。

科。」《新唐書·儒學傳》曰：「徐楚璧，初應制舉，三登甲科。開元時爲中書舍人、集賢院學士，帝屬文多令視草。……後更名安貞。」因爲此人三應制科試，所以徐松《登科記考》卷二七〈附考·制科〉中也有記載，除引《舊唐書》、《唐詩紀事》外，還引及《新唐書·褚無量傳》，徐安貞事即附褚傳之下。

此人或云徐璧，或云徐楚璧，不知前者誤奪「楚」字呢？還是本名徐璧，字楚璧，以字行；如江總字總持，李白字太白，杜牧字牧之之例？不管怎樣，此人即徐安貞無疑，那就不能將其歸入「世次爵里無考」者。

《全唐詩》於徐璧〈失題〉之下，又列徐安期〈催妝〉一詩，曰：「傳聞燭下調紅粉，明鏡臺前別作春。不須面上渾妝却，留著雙眉待畫人。」此詩並見《搜玉小集》、《唐詩紀事》卷十三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卷五五、《永樂大典》卷六五二三。《唐詩紀事》署名徐安期，《搜玉小集》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署名徐璧，《永樂大典》署名徐璧，「璧」字當係形近而誤。如上所言，徐璧即徐安貞，「期」字亦誤。這裡發生的一系列錯誤，經過佟培基、陳尚君等人的考證，逐步加以清理，得出了可信的結論。^⑮

從上面提到的一些文獻來看，可以看出由於時代的不同因而取資也各異其趣。毛晉曾將《搜玉小集》刻入《唐人選唐詩（八種）》，然而清初學者對此並未重視。^⑯康熙之時，對前代科舉制度作系統研究者尚未有所聞，因而未見《登科記考》之類的著作問世。最能說明康熙之時的學者治學局限的地方，是他們未能利用歷代類書，主要是《永樂大典》中的材料作校讎和輯佚之用，這要到乾嘉學術形成風氣之後，才有大的開發和收穫。《全唐詩》第十一函、七冊、七七〇卷錄潘圖〈末秋到家〉詩一首，曰：「歸來無所利，骨肉亦不喜。黃犬却有情，當門臥搖尾。」似爲作者落第歸家有感而作。徐松《登科記考》卷二七〈附考·進士科〉據《永樂大典》引《宜春志》，定爲宜春人。又《全唐詩》第九函、一冊、五五一卷有盧肇〈及第後送潘圖歸宜春〉詩，盧肇爲會昌三年進士，潘圖的生活年代由此可知。御定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未能利用《永樂大典》與《全唐詩》中的材料，疏失之甚。

^⑮ 參看佟培基：〈《全唐詩》無考卷考〉與〈續考〉，分載《河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三十一卷二期與三十二卷二期（1991年3月與1992年3月）。《全唐詩續補遺》卷三陳尚君按語，載《全唐詩補編》上冊（中華書局，1992年版）。

^⑯ 參看李珍華、傅璇琮：〈《搜玉小集》考略〉，載《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》（中華書局，1992年版）。

《全唐詩》第十一函、七冊、七七二卷錄韋鎰〈經望湖驛〉詩一首，岑仲勉〈讀《全唐詩》札記〉曰：「韋鎰。按《姓纂》，令儀生鎰，監察御史。據《衡州集》六〈韋武碑〉，鎰終禮、吏、戶三侍郎。」¹⁷可知此人在《元和姓纂》中有記載。林寶《元和姓纂》是唐代姓氏書中的一部重要著作，惜至宋代即有散佚，清代《四庫全書》館臣利用《永樂大典》重行輯出，有益後代史學匪淺。韋鎰曾官監察御史，故〈唐御史臺精舍題名〉上有記錄，趙鉞、勞格《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》卷三〈碑陰下層題名〉韋鎰下引《舊唐書·元載傳》與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三七〈紀聞〉中的記載為證。韋鎰曾任禮、吏、戶三部侍郎，嚴耕望《唐僕尚丞郎表》卷十〈輯考三下〉亦有考證，以為韋鎰之卒約在天寶十一、二載，時年四十九，故可姑定其由吏侍轉戶侍卒官。¹⁸又《新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四上列鎰於逍遙公房，敘其世系頗詳，《全唐詩》以為「世次爵里無考」，亦可見其考證之疏。〈經望湖驛〉詩尚見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九八。

《全唐詩》第十一函、七冊、七七〇卷錄唐暄詩三首，內有〈贈亡妻張氏〉一首，曰：「嶧陽桐半死，延津劍一沈。如何宿昔內，空負百年心。」又《全唐詩》第十二函、七冊、八六六卷〈鬼〉詩中有唐暄妻張氏〈答夫詩〉二首，附唐暄〈悼妻詩〉二首、〈贈妻詩〉一首，後詩即前唐暄〈贈亡妻張氏詩〉。同一詩歌而詩題有別，作者一人作唐暄、一作唐晷，亦未統一，可見其工作之草率。〈答夫詩〉後有注，曰：「晉昌唐晷，娶姑女張氏，頗有令德。開元十八年，晷入洛，妻卒於衛南莊。後數歲得歸，追感陳迹，賦詩悲吟，忽見張氏前來，曰：『感君記念，冥司特放兒來。』因相拜款語。下簾幃，申繾綣，宛如平生。晷以詩贈張氏，氏亦裂帶題詩以答，天明別去。」察其情節，知出小說無疑。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不注出處，一般讀者也就很難知其始末。查此故事原出陳劭《通幽記》，原書已佚，今見《太平廣記》卷三三二，文字甚詳，末云「事見唐晷手記」，似乎實有其事，確出唐晷手筆，實則此亦小說手法，自非事實。《古今說海》〈說淵部〉收入此文，標題即曰〈唐晷手記〉，此亦明人偽造篇名慣技，不足為據。《唐音統籤》卷九九八〈王籤〉即據此載之，而

¹⁷ 此文原載中央研究院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九本（1947年9月出版），後與岑氏另一著作〈唐人行第錄〉等文合成一書，即以「唐人行第錄」為書名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3月新一版）。

¹⁸ 此書原以臺北《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專刊》之三十六單行本出版，今據中華書局1986年10月影印本。

《全唐詩》却抹去出處，在這些編校人員看來，或許以為實有其事，故將詩歌分別歸於唐暄、張氏二人名下，然稍加分析，即知此事出於編造，二人均出假託，詩歌應為《通幽記》作者陳劭所作。如何處理小說中的詩篇的署名，問題確很複雜，但以之歸於鬼的名下，則其不妥人盡可知。

《全唐詩》卷七七二錄馬逢詩五首，亦以為世次爵里無考，然《唐才子傳》卷五即有其人之傳記，傅璇琮主編《唐才子傳校箋》內，吳汝煜、胡可先曾對之作詳細之校箋，於此可窺《全唐詩》編校人員與今日研究人員水平相差之巨，此亦可知有關唐詩的研究，康熙之後已經取得巨大的發展與豐碩的成果。

總的說來，《全唐詩》的編校工作之所以未能盡如人意，眾翰林迫於王命，急於成書，未能作細緻加工，固然是重要原因，但他們雖有詩才而短於詩學，所以即使勉勉從事，也有力不勝任的地方。況且他們生活在康熙之時，樸學未盛，很多有關考據的學術分支和重要著作，都未產生，這是時代的局限，不是個人所能解決的。讀者對此應持客觀的態度，而不宜苛求前人。

四、小結

知人論世，應把一件事放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，才能得出客觀而正確的結論。

一代有一代之學術，每一個人都有其時代的局限。所謂「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」，是說時代向前發展了，前人難以克服的障礙，經過後起者的努力，已經創造了克服困難的條件，後人才能繼起取得前代無法企及的成績。

學術研究是不斷向前發展的。同為後人憑藉的材料，研究成果和處理問題的經驗多了，他們也就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得出更為縝密的結論。

如果說，今人用古典詩文的形式從事創作難以超越前人，那是容易理解的，因為用古典形式反映今天的生活，比較困難；又因時代不同了，今人於此勢難投入很多精力，從小進行鍛練，因此，他們在古典詩文的創作上，因為條件的差異，很難與前人爭鋒。但古籍整理首先需要的是學識，這點今人可未必遜於前人，因為今人所接受的訓練和具備的條件，都要優於前人，因此御定《全唐詩》中的不足之處，今人自可加以克服和彌補。現在我們試圖編纂一部較為理想的《全唐五代詩》，也是基於這種信念。